

近五十年來台灣地區關於宋代書院研究的回顧*

吳眉靜

壹、前言

宋代的教育特色是官學與私學並行，兩者互為消長。屬於官學者，中央有國子學、太學、小學、廣文館、四門學、各級貴族學校及律、算、書、畫、醫、武等專門學校。地方則有府、州、軍、監及縣學等各級官學。至於私學方面，則以書院為代表。

書院的名稱，最早見於唐玄宗開元年間的麗正書院。然而當時的書院為藏書之所，其性質類似今日的「圖書館」，並不富有教育精神，而真正蘊含教育精神的書院，則開始於北宋初年。書院制度在兩宋時期縱然有盛衰變遷，然而卻並未中斷，其不僅具有學校教育的功能，甚至對宋代的政治、社會、教育、學術各方面，亦產生重大的影響。此外，宋代的書院制度也為元、明、清三代的書院教育奠定垂遠立久的基礎，因此其重要性不容忽視。

因為中外學者對於書院的研究作品浩繁，囿於時間與精力，本文的評述範圍僅先以台灣地區為限。希望藉著本文的回顧，能一探台灣地區對於宋代書院制度的研究成果，也藉以思考未來的研究方向。

* 本文得以完成，承蒙廖隆盛老師之指導，特此誌謝。又雷家聖學長、鄭永昌學長亦提供不少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貳、研究史回顧

對於台灣地區關於宋代書院的研究成果，筆者分成以下六個方面探討：

一、書院的起源與興起的背景

(一) 書院的起源

對於宋代書院制度的起源，早期學者一致認為與佛教的禪林制度有關。陳東原《禪林的學校制度》一文中，認為書院制度與佛教的禪林制度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他說：「七世紀以後，所謂佛教，幾乎就是禪教。禪林就是禪教的廟寺。……，可以知道八世紀時，禪林的學校制度是如何的詳備。……書院的產生，受此影響甚大。」¹盛朗西、楊家駱均承襲此觀點，也認為宋儒講學的書院深受禪林制度的影響。²戰後以來的學界對於此課題則存在著多元的看法。嚴耕望使用《太平廣記》等唐及五代的筆記小說，撰寫〈唐人讀書山林寺院—兼論書院制度之起源〉一文，並指出「宋代書院制度，不但其性質由唐代士子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演進而來，即『書院』之名稱亦由此種風尚中所形成。宋人承之而大其規制，以為群居講學之所耳。」³由此可知，嚴耕望認為書院制度的產生和唐代士人喜愛於山寺讀書的風氣有關。陳道生則引用正史的資料，如《漢書》、《後漢書》、《晉書》、《梁書》、《陳書》、《隋書》及《蜀中廣記》等的記載，駁斥陳氏及嚴氏的論點，提出書院制度中乃是從先秦時代一脈相承而來，並非受到佛教的禪林制度或唐代士人喜愛於山寺讀書的影響。陳文認為書院制度中的講學傳統及講堂，早在先秦時代已存在。先秦講

¹ 轉引自盛朗西，《中國書院制度》（台北市：華世出版社，1934年11月，初版，1977年3月，台一版），頁23-24。

² 盛朗西，《中國書院制度》，頁23；楊家駱，〈書院制之源起及其優點〉，《東方雜誌》，第37卷15號，1940年8月，頁27。

³ 嚴耕望〈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兼論書院制度之起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0期（下），1959年10月，頁726。

道術時已有講堂，兩漢時期則以講述經學為主，而魏晉時期則在精舍講述玄學與佛學，至於宋明時期則於書院講述理學。因此，石室精舍本來是以前儒者講學的處所，後來才被佛教徒承襲沿用。至於當時佛教精舍之所以相當盛行，乃是承襲漢魏以來的講學風氣。⁴孫彥民則綜合以上學者的看法，認為書院制度的建立，受到佛教禪林制度的影響，而禪林制度又受到儒家講學傳統的影響，即宋代的書院制度與佛教的禪林制度及儒家的講學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此外，他也認為書院制度與唐代士人喜愛在山林寺院讀書的風氣也有關係。⁵後期的學者，例如張正藩、葉鴻澗等人論及書院的起源時，往往採用孫彥民的說法。

（二）書院興起的背景

「書院」的名稱早在唐朝時就有記載，然而當時為藏書之所，類似今日的「圖書館」。直至宋朝初期，「書院」才開始其講學的功能，如此延續數百年，直至清朝才結束。因此，書院制度為何興起於宋朝，也成為一重要的課題。最早探討書院制度興起的背景者為陳東原，他認為書院制度的興起有以下原因：（1）從唐末五代以來政治社會動盪不安，待宋統一天下後，有志向學者增加，而天下初定，官學無法滿足士人的需求，因此書院應運而生；（2）禪林精舍的影響；（3）印刷術的發明不僅使書籍廣為流傳，而且使讀書風氣更為普及，因此有助於書院制度的發展。⁶後期學者孫彥民、邱兆偉、趙汝福、呂仁偉、吳萬居等人均承襲其說法，唯獨費海璣在〈宋代書院新考〉一文中，認為宋代書院的興起有六個重要的因素：（1）宋人重文輕武，所以設置書院以安置子弟；（2）學者為追求自由講學；（3）退休老官僚為培植其勢力；（4）收容流亡知識份子；（5）為滿足不斷增加的人口，因此設置書院，亦即書院是義聚

⁴ 陳道生，〈中國書院教育新論〉，《台灣省立師範大學研究所集刊》，第一輯，1958年，頁117。

⁵ 孫彥民，〈宋代書院制度〉，《台北市立女子師範專科學校暑期部學報》，第2期，1972年8月，頁5。

⁶ 陳東原，《中國教育史》（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36年7月，初版，1966年4月，台一版），頁276-278。

制度的產物；(6) 存神過化的現象，先儒名人等所行經之地，往往建為書院。⁷

由上可知，陳東原解釋書院制度興起的背景時，較強調外緣因素，且從文化史的角度剖析，認為書院與印刷術、士人向學意願強、官學不能滿足需要有關。而費海璣的見解，則從社會史的觀點切入，站在民間社會的立場詮釋書院制度興起的背景。但其思考強調內緣因素，偏重社會及心理層面，卻忽略將時代背景與歷史脈絡做一結合。

總而言之，各學者因使用之史料或切入角度之不同，在探討書院的起源與興起的背景時產生不同的觀點，若能加以整合，更可發揮「見樹亦見林」之功效。

二、書院的內部結構、分佈與興廢

(一) 院舍的性質與形式

至目前為止，並無專門的論述對書院院舍做詳細的討論，涉及此課題的論述不但屈指可數，而且僅是蜻蜓點水式地輕輕帶過。最早針對書院院舍的性質提出看法的是劉伯驥，但他僅指出宋代書院的院舍具有祠宇性質，⁸未有進一步的說明。葉鴻灑則對書院的建築形式有較為詳細的敘述，指出書院無論規模大小，皆具備講堂與齋舍。講堂為講學的處所，齋舍則為學子起居作息之所。而規模較大的書院，則有殿（祭祀先聖先師之地），閣、書庫（藏書之所），廊、軒、廡（建於講堂與齋舍間），以及亭、台、池（休息玩賞之處）等建築。⁹

(二) 經費來源與編制人員

⁷ 轉引自張正藩，《中國書院制度考略》（台北市：台灣中華書局，1981年3月，初版），頁17-18。

⁸ 劉伯驥，《廣東書院制度》（台北市：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58年2月，初版，1978年3月，再版），頁85。

⁹ 葉鴻灑，〈宋代書院教育之特色及其組織〉，《淡江學報》，第15期，1977年9月，頁76。

在書院的經費來源方面，盛朗西指出經費有的來自於田租，有的則是來自於官方供給。書院擁有學田，有的由政府賜予，有的則由私人捐撥。至於學田的收入，主要用於祭祀，其餘則提供老師與學生的日常生活所需。¹⁰至於編制人員，盛朗西指出書院有一主持人，但名稱有所不同，有洞主、洞正、堂長、山主、山長等名目。此外亦有副山長、助教、講師等。¹¹

（三）教材

書院富有自由講學之精神，但其講學的教材內容，主要仍為儒家經典。其中，陳青之認為教材以《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禮》、《儀禮》、《春秋》、《公梁傳》、《穀梁傳》等九經為主，另外還旁及史書、詩文。¹²而孫彥民則特別指出，教材內容以《易經》為主，行有餘力時才涉及其他經籍。¹³另外，陳繼新則使用《宋史》、《宋元學案》及「白鹿洞書院學規」等記載，指出課程內容主要應為四書、五經，偶爾旁及子、史及詞章之學。¹⁴

（四）分佈與興廢

對宋代書院的分佈與興廢有所研究者，首推曹松葉。他利用各省的地方志，將兩宋時期各省書院的建置、興復改造、毀亡的數目及創設書院的人物職業等，製表量化分析。由此可知，以省份而言，創設最多書院的是江西省，次為浙江省，最少的是直隸、山西與貴州三省。以流域而言，長江流域最多。以時間而言，書院最為興盛的時期是南宋理宗時期。¹⁵此外，盛朗西則進一步根據《宋元學案》，對各書院的名稱及詳細

¹⁰ 盛朗西，《中國書院制度》，頁 43。

¹¹ 盛朗西，《中國書院制度》，頁 45-46。

¹² 陳青之，《中國教育史》（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63 年 9 月，台一版），頁 223。

¹³ 孫彥民，《宋代書院制度》，頁 8-9。

¹⁴ 陳繼新，《從教育觀點析論宋代書院制度》，《學記》，第 3 期，1971 年 7 月，頁 97。

¹⁵ 曹松葉，《宋元明清書院概況》，《國立中山大學語歷週刊》，第 10 集，

之地理位置有所闡述。兩人的研究成果，皆是後人進行書院研究的重要基礎。另外劉伯驥、呂仁偉與吳萬居的研究中，也呈現出書院分布的地理概況。他們三人都大量採用方志資料，對於書院的院址、創建時間、性質及創建者有所敘述，但是劉伯驥的研究侷限於廣東地區，呂仁偉也僅研究浙江地區，而吳萬居則是簡介整個兩宋時期的書院。

上述論述中，曹松葉文可以讓讀者一探宋代書院的分佈概況，然而卻缺乏書院詳細的地理位置；盛朗西僅根據《宋元學案》的記載，介紹一些書院的名稱及地理位置，然而其並未使用含有豐富資料的方志記載，因此並不夠完備。至於劉伯驥、呂仁偉等文僅偏於特定省分，因此無法做一較為全面性的探討。吳萬居文也僅作介紹，並未多做評論。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學者所引用的資料多為清人撰寫的方志，其地理上的區域劃分根據的是清朝時期的行政區劃，然而清朝的行政區劃和宋代是截然不同的，並不能真實地呈現宋代書院分佈的特殊情形。

另外，區域性研究的書院並不多。劉伯驥與呂仁偉分別探討廣東及浙江地區的書院制度，時間橫跨宋元明清時期。其研究除探討該地書院的起源、變遷及影響之外，大部分篇幅著重於對書院的院舍情況、行政組織、經費、師生以及課程方面的研究。但劉伯驥文與呂仁偉文皆只重建地區書院演變之史實，並未指出該地書院的地方特色。相較於此，李弘祺的文章將書院置於建陽的兩大地方文化特色—土著大姓、佛教與其他迷信盛行—探討其對當地的影響。此文認為土著大族的推廣書院教育促成建陽地方文化與主流文化的契合，同時也減除人民的迷信思想，促成文風的盛行。¹⁶

綜上所述，對於書院的內部結構與分佈興廢的研究中，多是屬於通論性的著作，研究者常忽略「時間性」與「區域性」的因素，導致論述「以偏概全」。另外，書院是否因時、因地而不同，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111 期，1925 年 12 月，頁 7-9。

¹⁶ 李弘祺，〈建陽的教育(公元 1000-1400)—書院、社會與地方文化的發展〉，收入鍾彩鈞主編《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3 年)，頁 945—987。

三、書院的功能與精神

盛朗西文最早指出宋代的書院有三大功能，即藏書、講學、祭祀，其中以講學最為重要。¹⁷吳萬居則主張除此之外，書院尚有讀書、刻書等功能。¹⁸盛朗西的三大功能說主要是針對大部分書院而言，至於吳萬居所指出的讀書、刻書功能，並非所有書院皆具備，僅有少數書院具備此二項事業，故此並非書院事業的常態。此外，以祭祀對象而言，多是有功德的先儒學者，其中較為重要者，盛朗西認為有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及朱熹，陳青之則認為「書院內必崇祀孔子，故每個書院必塑有孔子及十哲的肖像，甚至圖畫七十二賢一同配饗。」¹⁹盛朗西提出的人物均為兩宋時期學者，待其去世成為祭祀對象時當為南宋之後，故而北宋初期書院制度方興起時，院內祭祀對象是否如陳青之所言為孔子及其弟子，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至於書院的精神與特色，胡適認為書院代表時代精神，書院所祭祀的先儒學者足可反映當時的時代特色，而書院雖為講學的地方，但有時也是議政之處。另外，書院的真正精神則在於自修與研究。²⁰後期學者論及此一課題時，多以此說法為基礎，認為書院的精神與特色為：講學自由、致力學術研究、尊師重道、注重德操、表現議政及反科舉精神等。另外，葉鴻灑、郭紀青則著重書院的教育思想所呈現出來的特色，也就是對教材內容、教學方式、師生關係等作一探討。葉鴻灑認為書院對於教材的選擇具有自主性、生徒的資格與年齡並沒有限制、修業的年限不定，並且能施行言行並重及因材施教的教育。²¹而郭紀青的看法與葉鴻灑相同，並且對師生間的關係有更進一步的探討，他認為宋代的書院重建

¹⁷ 盛朗西，《中國書院制度》，頁 47。

¹⁸ 吳萬居，《宋代書院與宋代學術之關係》（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初版），頁 70-91。

¹⁹ 陳青之，《中國教育史》，頁 233-234。

²⁰ 胡適，《書院制史略》，《東方雜誌》，第 21 卷 3 號，1924 年 2 月，頁 108-109。

²¹ 葉鴻灑，《宋代書院教育之特色及其組織》，頁 57-65。

了師生之間的倫理關係。²²

由上可知，關於書院功能與精神的論述中，研究者亦忽略將時間與地理因素納入考量，也因此研究作品仍屬通論性質。

四、宋代書院與政治、社會、教育、學術的關係

(一) 書院與政治的關係

胡適認為書院不僅是講學之地，有時也是學者議論政治的機構，²³因此書院或多或少地對政治具有影響力。陳道生則認為書院制度的發展，使高等教育更為普及，並且消除魏、晉、隋、唐以來士族把持政治的傳統，使政治不再操持於貴族手上。²⁴此課題中以葉鴻灑的觀點較為不同，認為書院的影響不僅止於當代，甚至對後代的政治也影響深遠，例如書院的講學制度，使漢人的知識程度遠高於蒙古人，因此漢人得以在異族統治的元代掌握文教大權，進而使內諸夏而外夷狄的傳統思想藉著書院而深入民間，導致元代的急速滅亡。²⁵但此推論似稍嫌輕率，有待更具說服力的論證。

(二) 書院與社會的關係

在書院與社會的關係方面，學者多將焦點置於書院制度對社會的影響。孫彥民、陳繼新、葉鴻灑均認為書院中充滿著「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因為宋儒的講求修身養性，因此轉移了當時的社會風氣。其中葉鴻灑更提出另一項觀點，認為書院對社會的影響之一是從佛寺中收回民間的教育大權。²⁶但此亦有待商榷，蓋佛寺在傳統中國是否擁有教育權，大有疑問。陳雯

²² 郭紀青，〈宋代書院特色及其對教育的影響〉，《台中師院學報》，10期，1996年6月，頁14-17。

²³ 胡適，〈書院制史略〉，頁109。

²⁴ 陳道生，〈中國教育新論〉，頁136。

²⁵ 葉鴻灑，〈論宋代書院制度之產生及其影響〉，《國立編譯館館刊》，第1卷，第3期，1973年12月，頁218-219。

²⁶ 葉鴻灑，〈論宋代書院制度之產生及其影響〉，頁216。

怡的論著則是探討南宋書院與科舉制度的互動關係，指出科舉制度與南宋書院復興運動息息相關，因宋代社會是「科舉」社會，為追求科舉的利祿，故有「士人階層」的形成，然因科舉名額有限，使士人在科舉價值之外，逐漸發展出其自身的獨立價值與文化，這正可與書院的私學精神相呼應，也是促成南宋書院復興的原因。另外，南宋書院的興起本是為批判科舉，但為因應現實的需求，轉而與科舉相容，這也為書院能被社會廣泛接受的原因。²⁷

（三）書院與教育的關係

書院對教育的影響早為學者所關注，孫彥民便指出書院不僅對當時的官學有起衰救弊的功能，也使教育更為普及，並且建立了以後數百年民間教育的基礎，²⁸此觀點為其後的陳繼新、葉鴻瀾繼承。陳雯怡的研究則是以書院教育為主軸，探討南宋書院復興運動時，這種「新」教育模式的完成與傳佈。陳文認書院是南宋的教育重心，在官學逐漸成為科舉的利祿之學的情形下，學者為實現其教育理念，故紛紛興復書院。這種新的教育制度不同於北宋的書院，而是在舊傳統中蘊含新典範，亦即在官方制度中注入私學的精神，是一種官與私的模式。這種蘊含私學精神的教育理念，則藉著具體化的「學規」傳佈四處。逐漸地，書院中的私學精神影響書院以外的教育機構，形成「官學書院化」的現象；與此同時，書院的官方性格也日趨增強，逐漸形成「書院官學化」的現象。²⁹

（四）書院與學術的關係

就書院與學術的關係而言，陳道生的研究最早指出書院教育消除魏晉以來佛老的思想，使宋代成為以理學思想為主流的時代。³⁰孫彥民則進

²⁷ 陳雯怡，〈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1月，第五章。

²⁸ 孫彥民，〈宋代書院制度〉，頁11。

²⁹ 陳雯怡，〈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第二、三章。

³⁰ 陳道生，〈中國書院教育新論〉，頁137。

一步指出，書院促進理學的發達，若無書院的興盛則無理學。³¹葉鴻灑不但肯定書院促成理學的興盛，更指出書院也造成理學各派的分立，因為書院提供場所讓學者傳播其理論及造就接班人，因此使各派的學說得以成立，並且向四方傳播。³²另外，葉鴻灑也認為因宋代的學者以興復孔孟之道為己任，尤其南宋時期各書院多使用四書為教材，因此使孟子的學術地位逐漸提高，³³這種觀點也被後期的吳萬居所採用。吳萬居的《宋代書院與宋代學術之關係》是探討書院與學術關係的專門論著，因此他的研究較以往的學者深入。吳文以書院制度對理學及經學的影響為主軸，在理學方面，其觀念承襲以往學者的看法，認為書院促進理學的發達以及造成學派的分立；至於經學，則指出書院對經學的影響有：(1) 學者著書立說，充實了經典；(2) 學者治經趨向主觀，對於經典賦予新的意義，影響了理學之取向；(3) 疑經之風氣相當盛行，影響經學的發展；(4) 書院表章四書，提高了孟子的地位。³⁴

總而言之，學者對此課題的研究方向多集中於書院的影響層面，而研究成果則多肯定書院帶來的正面效果。然書院與這些領域的互動關係，又書院制度是否有其負面影響，仍待進一步的探討與分析。

五、書院與大儒

目前此課題的焦點多集中於朱熹與書院的關係。其中，李弘祺〈朱熹、書院與私人講學的傳統〉一文指出，朱熹是推動南宋書院興復運動的發起者，他透過「精舍」與「書院」達成私人講學的目的。³⁵陳榮捷〈朱子與書院〉則首先釐清「精舍」與「書院」的關係，進而介紹朱熹與書院的淵源關係，最後則肯定朱熹對書院有推進的作用，並且認為「精

³¹ 孫彥民，〈宋代書院制度〉，頁 12。

³² 葉鴻灑，〈論宋代書院制度之產生及其影響〉，頁 211-213。

³³ 葉鴻灑，〈論宋代書院制度之產生及其影響〉，頁 209。

³⁴ 吳萬居，〈宋代書院與宋代學術之關係〉，頁 209-235。

³⁵ 李弘祺，〈朱熹、書院與私人講學之傳統〉，《漢學研究》，第 2 卷，第 1 期，1984 年，頁 1-10。

舍」與「書院」是朱熹推動南宋書院運動及其實現新儒學的工具。³⁶另外，周杏芬〈朱熹與書院研究〉討論的主題與陳榮捷相同，只是內容更為豐富。此外，也有人研究其他儒者與書院的關係。蔡方鹿〈張栻與岳麓書院〉一文，認為張栻在岳麓書院執教，不但豐富了二程學說，並且促進了湖南、四川文化的發展。³⁷郭紀青的〈淺談南宋名師的教育觀〉則介紹南宋理學家朱晦庵、陸象山、呂東萊以及張南軒的生平及其教育的觀念。

38

六、書院制度的演變情形

對於書院制度的演變，有所著墨者為葉鴻瀾、樊克政及陳雯怡。葉鴻瀾與樊克政認為宋朝初年因為官學未興，但士人好學，故書院教育遂應運而起，逐漸成為一重要的教育機構。然而至神宗熙寧以後，卻開始萎縮，主要原因在於慶曆、熙寧及崇寧三度興學，官學制度逐漸確立之後，遂取代書院的地位。直至南宋時期，又因官學衰敗、理學被禁及士風卑下三大因素的影響下，促使南宋的書院教育迅速的復甦與發展，至南宋理宗時代達到最高峰。³⁹陳雯怡的論著則探討南宋學者復興書院時的理念、此種理念如何落實、以及落實後的結果。其研究指出原本書院復興時的理念落實至現實社會中產生轉化現象，作者從官學、政治、學術、社會各方面深入探討此理念轉化的原因。

葉鴻瀾根據諸多史料重建宋代書院制度發展的歷史，從其研究中得知書院的興衰與官學有密切的關係，然而遺憾的是其研究並不夠深入。陳雯怡的研究則從多種面向探討，深入頗析促使書院理念轉化的因子，是詳盡而精闢的論著。

³⁶ 陳榮捷著，萬先法譯，〈朱子與書院〉，《史學評論》，第9期，1985年1月，頁32。

³⁷ 蔡方鹿，〈張栻與岳麓書院〉，《孔孟月刊》，第29卷7期，1991年，頁25-31。

³⁸ 郭紀青，〈淺談南宋書院名師的教育觀〉，《台中師院學報》，第13期，1999年6月，頁283-321。

³⁹ 葉鴻瀾，〈論宋代書院制度之產生及其影響〉，頁198-207。

參、結 論

對於書院制度的研究，從 1920 至 1990 年代為止，每一時期均有不同的作品呈現。1980 年代以前，學者對於書院的探討，多將重心放在書院制度本身的結構，其中較為著名的有 1934 年盛朗西《中國書院制度》、1958 年劉伯驥《廣東書院制度》、1963 年孫彥民《宋代書院制度之研究》、1981 年張正藩《中國書院制度考略》等，這些作品主要都是敘述書院制度的起源、興起的背景、其精神與特色等。1980 年代以後，書院研究開始有了新的視野，學者開始投入書院與教育、學者、文化及學術關係的探討。總的來說，書院研究多是通論性的著作，時間常涵蓋數個朝代，論述範圍亦廣且常流於抄襲，少有新觀點的提出。另外，多數作品並未與當時的社會環境結合，常僅就制度論制度，缺乏「時間性」與「區域性」的概念。

以研究者的背景而論，教育學研究者較著重於對書院制度的起源、興起的背景及其內部組織結構的探討，並且喜愛以條列式的方式分項說明，對重建書院的史實貢獻極大，但遺憾的是常只就制度論制度，僅專注於探討書院制度的表象，卻忽略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作完整性的思考。中文系的研究者，如吳萬居、周杏芬等，常把研究焦點放在書院與學術、儒者的關係上。但僅著重於史實的重建，並未提出歷史解釋，其研究多「述而不作」，且僅作思想的傳承。與前二者多為寬而淺的論述相較，歷史學研究者的著作多為窄而深的研究，但已發表的作品不多。相較於其他領域的學者，歷史學研究者運用、蒐集、解讀史料的能力較強，如陳雯怡〈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一文便使用了 68 種文集，18 種地方志及其他諸多史料，單就資料的蒐集，已是極大的工程。

綜上所述，宋代書院的研究作品雖繁，但研究空間仍廣，尤應多結合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學術思想等層面來思考。例如以政治而言，政府對書院所抱持的態度為何？又政治上有「黨爭」的發生，書院是否為失意政客培植勢力之地？以經濟而言，劉伯驥曾說：「經濟條

件決定書院的存在。」⁴⁰呂仁偉也說：「經濟因素往往是決定書院興衰之主要條件。」⁴¹若是如此，書院與經濟的關係亦密不可分，也值得進一步探究。以教育而言，書院制度是一種私人講學的制度，而政府所興辦的教育則為官學，一為私人，一為官辦，這兩者間主要的差異性為何？又彼此的互動關係為何？以學術思想而言，宋代書院的自由講學風氣相當盛行，但自此以後開始走下坡，原因為何？以上所舉，皆是值得探究的問題。

此外，研究者也可多做書院間的比較，這也是以往研究者忽略的層面。將不同書院的經費來源、編制人員、教材內容、講課的儒者等加以比較與探討，則可以看出不同區域的書院學風是否有所差異；也可比較不同學派與書院的關係；甚至比較不同地區書院的興衰與當地社會經濟演變的關係。

⁴⁰ 劉伯驥，〈廣東書院制度〉，頁 7。

⁴¹ 呂仁偉，〈浙江書院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2 年 6 月，頁 65。

關於宋代書院之主要研究成果(以台灣出版或發表者為限)

論文

- 胡適，〈書院制史略〉，《東方雜誌》，第 21 卷 3 號，1924 年 11 月。
- 曹松葉，〈宋元明清書院概況〉，《國立中山大學語歷週刊》，第 10 集 111 期-114 期，1925 年 12 月。
- 楊家駱，〈書院制之源起及其優點〉，《東方雜誌》，第 37 卷 15 號，1940 年 8 月。
- 陳道生，〈中國書院教育新論〉，《台灣省立師範大學研究所集刊》，第一輯，1958 年。
- 于肇怡，〈書院制度及其精神〉，《民主評論》，第 10 卷 13 期，1959 年 7 月。
- 嚴耕望，〈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兼論書院制度之起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30 期(下)，1959 年 10 月。
- 邱兆偉，〈宋代書院教育之成因〉，《台灣教育輔導半月刊》，第 17 卷 2 期，1967 年 2 月。
- 陳繼新，〈從教育觀點析論宋代書院制度〉，《學記》，第 3 期，1971 年 7 月。
- 趙汝福，〈中國書院制度〉，《台中師專學報》，第 2 期，1972 年 2 月。
- 葉鴻灑，〈論宋代書院制度之產生及其影響〉，《國立編譯館館刊》，第 1 卷 3 期，1973 年 12 月。
- 葉鴻灑，〈宋代書院教育之特色及其組織〉，《淡江學報》，第 15 期，1977 年 9 月。
- 黃金鰲，〈我國書院制度及其精神〉，《鵝湖》，第 4 卷 1 期，1978 年 7 月。
- 呂仁偉，〈浙江書院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2 年 6 月。

- 李弘祺，〈朱熹、書院與私人講學之傳統〉，《漢學研究》，第 2 卷 1 期，1984 年。
- 陳榮捷著，萬先法譯，〈朱子與書院〉，《史學評論》，第 9 期，1985 年 1 月。
- 蔡方鹿，〈張栻與岳麓書院〉，《孔孟月刊》，第 29 卷 7 期，1991 年 3 月。
- 丁綱，〈書院與後期儒學的推進〉，《孔孟學報》，第 63 期，1992 年 3 月。
- 李弘祺，〈精舍與書院〉，《漢學研究》，第 10 卷 2 期，1992 年 12 月。
- 李弘祺，〈建陽的教育(公元 1000-1400)——書院、社會與地方文化的發展〉，收入鍾彩鈞主編《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3 年。
- 周杏芬，〈朱熹與書院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 6 月。
- 陳雯怡，〈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年 1 月。
- 郭紀青，〈宋代書院特色及其對教育的影響〉，《台中師院學報》，第 10 期，1996 年 6 月。
- 23 郭紀青，〈淺談南宋書院名師的教育觀〉，《台中師院學報》，第 13 期，1999 年 6 月。

專書

- 盛朗西，《中國書院制度》，台北市：華世出版社，1934 年 11 月，初版，1977 年 3 月，台一版。
- 劉伯驥，《廣東書院制度》，台北市：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58 年 2 月。
- 孫彥民，《宋代書院制度之研究》，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教育叢刊，1963 年 6 月。
- 張正藩，《中國書院制度考略》，台北市：台灣中華書局，1981 年 3 月，初版。

吳萬居，《宋代書院與宋代學術之關係》，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初版。

樊克政，《中國書院史》，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5年9月，初版。